

# 第一章 緒論

在我們第三世界中，以台灣如此之小的版圖及人口，能夠脫穎而出，成為世界的經濟貿易大國，的確有許多的因素使然。到底台灣婦女占有多大的位置，從文學藝術的捕捉來提證，當然是十分不足的。不過，就神學的創造與救贖的意義而言，在台灣寫實小說中我們見到這麼多寶貴的女性，不禁使我們聯想到彌賽亞的性質，她們不僅是順服的、獻身的母親，她們更是我們社會尋求盼望與意義的種子。我們也可換句話說，我們從台灣小說中的女性，見證了台灣，也見證了台灣如何渡過危機，實現救贖的生命。

——李漢偉<sup>1</sup>

##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949年12月，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政局動盪。不過，就在國際東西兩大集團的強烈對抗下，台灣因此獲得了一絲喘息的機會<sup>2</sup>。然而到了70年代，由於對峙的局勢趨向緩和，生存的困境逐漸浮現，接連不斷的外交頓挫，讓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曖昧地位更顯孤立與脆弱<sup>3</sup>。但在如此險惡的逆境下，台灣並未陷入混亂，迨及1970年代以後，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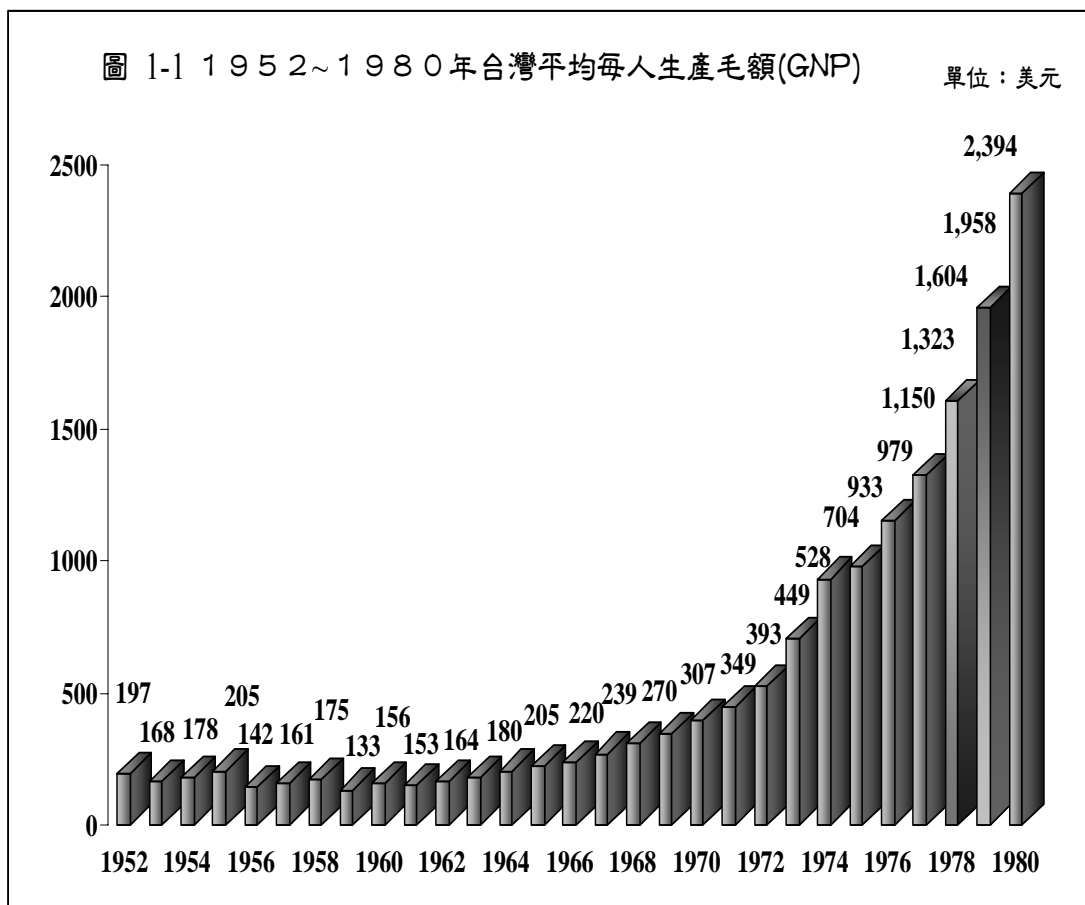
<sup>1</sup> 李漢偉，《台灣小說的三種悲情》，台北縣：駱駝出版社，1997年，頁121~122。

<sup>2</sup>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重新認知到台灣軍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將台灣納入其防共圍堵政策的一環，隨即提供軍經援助。1954年雙方正式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美關係正式恢復，穩定了國民政府政權在台灣的發展。

<sup>3</sup> 美國企圖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抵制蘇聯政權，1971年7月總統尼克森宣佈訪問北京的計畫，日本隨即於9月承認中共，取消1952年簽訂的對台和約，引發骨牌效應，重要邦交國紛紛與台灣斷交，轉與中共建交。1971年10月，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至1978年底，美國終止與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翌年1月承認北京為中國合法的政府，台灣夾處於國際社會的孤立與脆弱暴露無遺。

而締造出舉世矚目的「台灣奇蹟」，也憑藉著這項傲人的經濟成就，安然度過爾後的台日斷交、退出聯合國以及國際石油危機等重大考驗。

台灣的經濟發展究竟何等稱奇，在 1950 年代，台灣的國民所得與南韓、肯亞相當，遠低於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到了 80 年代則已經大幅領先這些國家<sup>4</sup>，再從下「圖 1-1 1952~1980 年台灣平均每人生產毛額(GNP)」來看，台灣經濟飛躍的程度十分顯明。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782317174471.xls>

<sup>4</sup> 從 1950 到 1980 年代的平均國民所得：台灣 224⇒2,730 美元，韓國（南韓）146⇒1,553 美元，肯亞 129⇒380 美元，巴西 373⇒1,780 美元，墨西哥 562⇒1,640 美元，阿根廷 907⇒2,230 美元。整理自金耀基，〈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韋伯學說的重探〉，《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7 月再版，頁 42。

台灣經濟變革的重大關鍵在於 1966~1981 年的「工業化時期」<sup>5</sup>，也就是「出口擴張時期」<sup>6</sup>。不過，這並非歸功於本身自發的動力，1960 年代的台灣還面臨許多危難的挑戰<sup>7</sup>，此階段的經濟起飛，主要來自於國際情勢的適時造就與政府政策的積極迎合<sup>8</sup>，尤其從 1966 年開始設立加工出口區之後，更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揭開新的里程碑<sup>9</sup>。

1960 年代，資本主義（capitalism）重整成破除國界的跨國性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在其追求獲利的最高目標之下，也為經濟落後國家提供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機會<sup>10</sup>。

台灣加工出口區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吸引外資的大量挹注，除了各

- 
- 3 根據嚴祥鸞的分法，台灣工業化的演變階段，可區分為「工業化前期」（1951~1965）、「工業化時期」（1966~1981）、「後工業化時期」（1982 以降）等三個階段：工業化的前期，生產制度以農業為主，政府的政策為「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帶動農業」；工業化時期，生產制度以工廠加工製造業為主，屬勞力密集；後工業化時期則是以服務業為主要的生產制度。請參閱嚴祥鸞，〈台灣勞動市場性別分工的解析 1951~1994〉，《勞資關係論叢》，第 5 期，1996 年，頁 155。
  4. 魏萼將台灣經濟發展分為 1950 年代起的「進出口替代時期」、1960 年代起的「出口擴張時期」；葉萬安則將台灣工業的發展劃分為 1953~1960 年的「第一階段進口替代階段」、1961~1972 年為「出口擴張階段」、1973~1984 為「第二階段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二者與嚴祥鸞分類的時間大致吻合。請參閱：魏萼，《中國式資本主義——台灣邁向市場經濟之路》，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3 月初版，頁 45~67；葉萬安，〈台灣工業發展政策的研訂與實施〉，收錄於于宗先、劉克智主編，《台灣的工業發展》，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4 年 6 月，頁 682。
  - 7 台灣的自然條件並不優厚，資源也不充裕，1950 年代的產業技術水準十分落後，1960 年代，以民生必需品進口替代工業更已經面臨國內市場的飽和，尤其到了末期，面對美援結束、外資不足、貿易逆差、國內資金短缺等困境，亟待海外資金的投入；復加人口快速的增長，農村勞力過剩，迫切需要創造就業機會。請參閱林鐘雄，《台灣經濟經驗一百年》，台北市：三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8 月初版，頁 81。
  - 8 諸如：1960 年的外匯制度改革，1963 年開始出現明顯的產業結構變化，1965 年美國終止對台灣的經濟援助，1960 年代末期先後建立對日、美經貿關係的歷史淵源等，政府在此階段建構出「出口為主、勞力密集」的經貿政策，之後的 20 年間，是台灣出口成長帶動經濟成長的重要時期。參見成露茜、熊秉純，〈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台灣個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4 期，1993 年。
  8. 「高雄加工出口區」是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也是全世界加工出口區的首創，為兼具自由貿易區、工業區兩者優點的綜合體。。
  - 10 跨國性公司從最便宜的地方購買原料，到生產成本和勞動力最低廉的地方生產，再把產品販賣到獲利最多的地方，以保證獲取最高的利潤。透過這種國際勞動分工方式，經濟落後地區被納入了世界生產體系。

項免稅優惠及便利的條件外，最受到國、內外企業青睞的莫過於「低廉的生產成本」。這種以勞力密集、加工製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即是以廉價人力來降低生產的成本為前提，進而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為優勢，當時扮演這種角色的正是眾多台灣年輕女性所提供的勞動力<sup>11</sup>，她們當然是促成台灣經濟奇蹟的重要推手。

婦女就業與台灣工業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從下「表 1-1 台灣重要經濟指標與產業成長率（1951~1988 年）」與「圖 1-2 台灣地區 1965~1987 男女勞動參與率比較」的交叉比對來看，工業化程度越高，婦女就業的比率就越高，女性在台灣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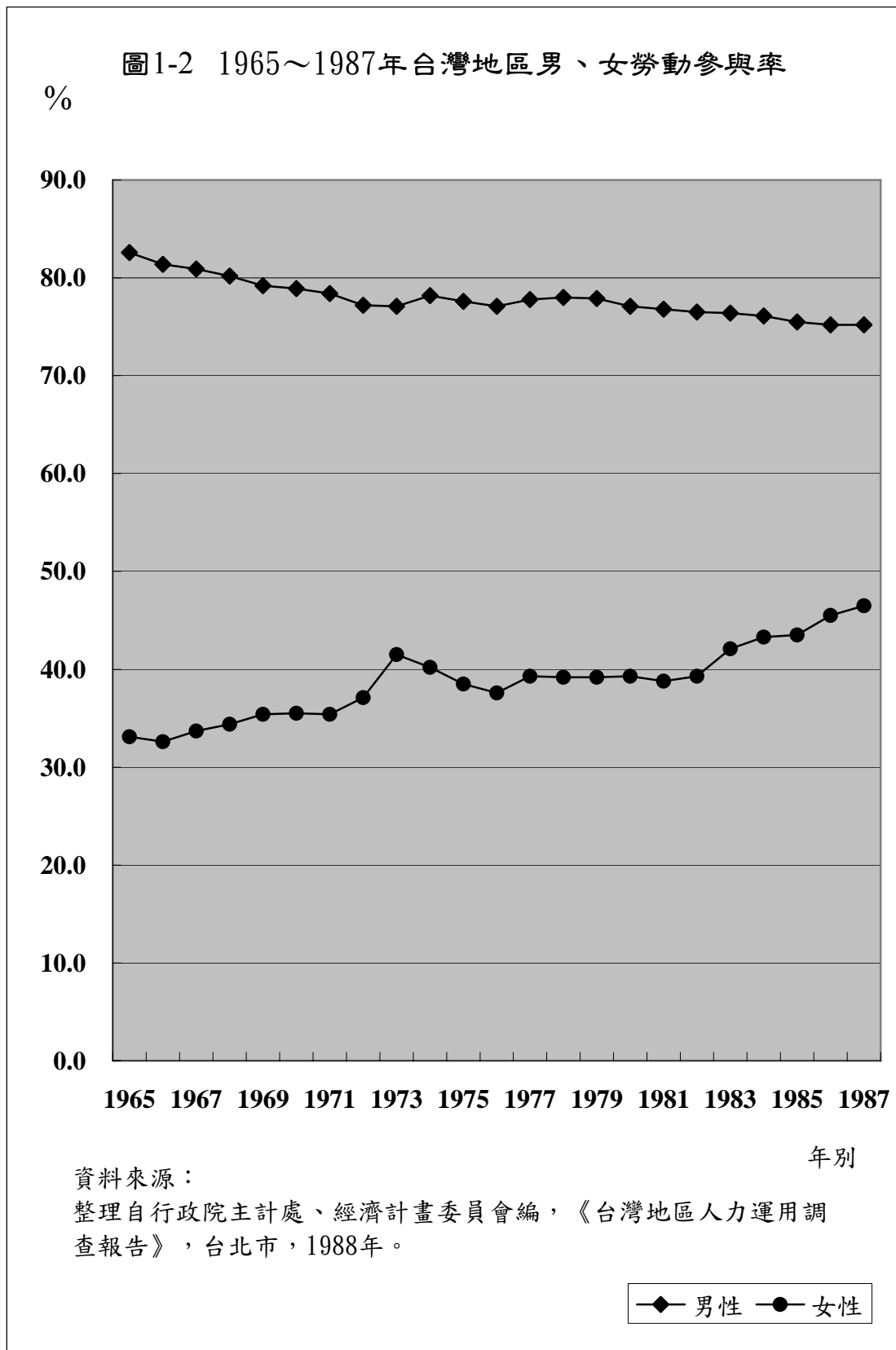
表 1-1 台灣重要經濟指標與產業成長率(1951~1988 年)

	1951 年	1961 年	1971 年	1981 年	1988 年
平均每人 G N P	1493	6078	17730	98179	182511
國內生產毛額（新台幣/元）	123	700	2637	17739	35232
經濟成長率（%）	※	6.88	12.9	6.16	7.84
農業成長率（%）	※	※	1.44	-0.44	1
工業成長率（%）	※	※	20.19	6.19	5.01
製造業成長率（%）	※	※	22.8	7.6	3.99

註：※代表當年無資料

統計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統計月報》。

<sup>11</sup> 學者對於促成台灣經濟發展奇蹟的原因究竟為何，眾說紛云，其中爭執最少的就是台灣擁有價格低廉，招募和解僱都容易的勞工，而且多位學者指出婦女正是組成這股勞動力的主要成員。請參見成露茜、熊秉純，〈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台灣個案〉，頁 41。



台灣的經濟奇蹟不單只是仰賴資本家的投資，更是建立在眾多勞動者辛勤工作的基礎上，特別是將大半青春都貢獻在生產線機台的女工們。在讚訟輝煌經濟成就的同時，工業化如影隨形產生的勞工問題不應漠然以對，尤其是女工們的處境，更值得吾人重新認知與理解，況且「她們」的出現，對台灣的社會、文化、家庭等各方面亦掀起了強大的激盪作用。

70、80 年代，越來越多的西方歷史學家開始質疑 1960 年代「新史學」或「社會史」的基本論調。60 年代這群自稱是「進步論歷史學家」的「新史學家」，曾經高舉「現代化」<sup>12</sup>是一種積極的力量，世界歷史進程的特徵就是「現代化」<sup>13</sup>。

強調「由下而上」來研究歷史的「新文化史」，在 80 年代逐漸成型，取代了「新史學」中的社會、經濟與人口史，儼然成為史學界的新寵兒<sup>14</sup>。「新文化史」關注的焦點不再是過去的上層菁英，社會的底層大眾成為他們心目中的主角，也使得史學論述的核心從過去的宏觀

<sup>12</sup>「現代化理論」是二次戰後，美國社會科學家在社會學結構功能理論的基礎上所建構出。在不同領域有著不同的解釋，大致來說，其基本論調是認為落後國家必須採納根植於西方科技、經濟複合底層之行動模式，如此才能促使他們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結發生變化，進而蛻變成高度發展國家。換言之，「現代化」的本質就是「西化」，強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社會發展的理想型態，工業化為全人類創造了某種共同的文化，任何國家只要仿造工業先進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就能在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政治運作等方面產生實質的變化。參見杭之，《一羣集—現代化發展的反省斷片》，台北市：允晨出版社，1987 年，頁 2；中華雜誌譯，〈現代化與工業化〉，收錄於侯立朝編，《當代思潮引導》，台北市：帕米爾出版社，1985 年，頁 160-161；楊國樞、黃光國，《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台北市：桂冠文書圖書公司，1991 年 8 月，頁 241。

<sup>13</sup>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一文中就聲稱，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為原則，加上在隨其衍生而成的議會制度的基礎上，現代化社會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這標誌著理性的秩序所取得的成就。參見 Georg G. Iggers 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台北市：昭明出版社，2003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157。

<sup>14</sup> 為了和 19 世紀末的 Jacob Burckhart 與 Johan Huizinga 的古典文化史作區別，1989 年美國新文化史家 Lynn Hunt 在《The New Cultural History》導論〈History, Culture, and Text〉中，首次將 1980 年代的這種史學研究類型稱之為「新文化史」。請參考蔣竹山，〈「文化轉向」的轉向或超越？——介紹四本論歐美新文化史的著作〉，《新史學》，第 12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頁 233~246。

歷史學轉向微觀歷史學<sup>15</sup>。

對「新文化史」的史家而言，雖然並未全盤否定現代化具有積極的性質，不過他們却進一步認知到其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指出，現代化進程釋放出來的不僅是巨大的生產力，更是極具破壞力，而且這與現代化進程是不可分割的。甚者，這樣的惡果已經發生，並主要落在長期被歷史學家忽略的「小人物」身上；於是他們高呼歷史研究的主題應該從權力「中心」轉向「邊緣」——也就是轉向「許多人」的日常生活狀況。所謂的「許多人」，主要是指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和被剝削的人，「新文化史」強調不要讓他們消失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或淹沒於無名的群眾當中<sup>16</sup>。英國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訪談錄中曾經提到：

新文化史的史家們大多認為，個人是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他們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長時段裡影響歷史的發展，他們的行為展現了他們的特點，微觀史家 Carlo Ginzburg 已經非常清楚地指出這點。<sup>17</sup>

就「新文化史」史學所揭櫫的精神與意涵，重新檢視台灣歷史的研究，這群對台灣經濟貢獻居功厥偉，然而在史書扉頁卻不見經傳的女工們，是今日史學工作者不能也無法再漠然與忽略的，此點體悟與感發，亦是觸發本研究的起始點。

<sup>15</sup> Georg G. Iggers 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頁 157-183。

<sup>16</sup> Georg G. Iggers 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頁 157-159。

<sup>17</sup> 楊豫、李霞、舒小昫，〈新文化史的興起——與劍橋大學彼得·柏克教授座談側記〉，《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1月，頁 146。

## 二、研究範圍與研究成果回顧

誠然，要傾聽「底層人民」的聲音，猶如「空谷足音」，顯得「遙不可及」。不可諱言的，下層階級通常不具備論述的能力，關於底層民眾的歷史記錄，通常經由論述者（往往是知識份子）在採集匯整他們的意見後，透過菁英編寫後呈現而出，這種經過層層媒介（mediation）機制的轉化，過程中摻雜了許多難以避免的闕誤和扭曲，由此撰述所得的觀點能否據實且「原音重現」？這般轉播製成的「發言」，又是否足以代表所謂「底層人民自己的心聲」<sup>18</sup>？這些都是值得思量商榷的。

這樣的難題，同樣也困擾著本研究。當年肩負產業生產重任的廣大女工們，大多是學歷不高（將於第二章深入探討），加上每天日夜趕工的辛勞，出自她們自身的論述真可謂是「鳳毛麟角」、「滄海一粟」。

不過，如此的困境，卻在 1970 年代之後以寫實主義、關注本土為核心的台灣文學上找到一線希冀。

盧卡奇說：「小說是脫序世界的鏡中影像」、「小說是這樣一種時代的史詩。」<sup>19</sup>他相信「文學反映社會現實」<sup>20</sup>，李漢偉在《台灣小說的三種悲情》亦云：

文學是生活的鏡子，時代的脈搏，更是大眾百姓的心聲。文學不僅不能須臾背離和冷視生活、時代、土地和人民，而且必須始終緊緊地與生活、時代、土地和人民融合一個整體，藝術地再現生活的現實性、時代的使命感、土地的真正色澤和人民的最強

<sup>18</sup> 廖炳惠，〈後殖民研究的問題及前景〉，《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台北市：立緒出版社。1997，頁 127-128。

<sup>19</sup> 劉昌元，《盧卡奇及文哲思想》，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年 12 月初版，頁 86、69。

<sup>20</sup>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 5 月初版，頁 267~268。



音。<sup>21</sup>

李豐楙進一步主張文學作品足以反映時代變遷，而且「台灣社會從不變到巨變、從超穩定的結構到面臨結構性的變局，在變與不變辯證關係中，作家敏銳地觀察人、人群中的小人物，因而發現這些社會小角色具現出某些特質，他們的動作、性格所表現出來的，不是扁平型人物中的簡單刻畫，而多是具有某種原型性，是一種傳統文化積澱下的集體意識的反映。」<sup>22</sup>因此，時代脈動與社會變遷的歷程，被文學作品保留封存於其中，提供尋覓底層心聲、真實再現的一種可能性。

以下則先就本研究論題的相關概念與範圍設定逐一界定與說明：

## 1.台灣文學的界定

所謂的「台灣文學」，依據游勝冠的界定，至少有三種涵義<sup>23</sup>：

### 一、從中國立場所掌握的「台灣文學」：

持中國立場者，有中國當局與懷有中國民族主義者，從其共同的「統一」立場看來，主張以「台灣文學」稱呼台灣本地的文學，多少都帶有「分離主義」的傾向。他們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所謂台灣文學就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 二、以台灣立場、台灣意識標明的「台灣文學」：

<sup>21</sup> 李漢偉，《台灣小說的三種悲情》，頁 178。

<sup>22</sup> 李豐楙，〈台灣鄉土小說中的社會變遷意識——60、70 年代鄉土小說的主題：貧窮、命與人性〉，收錄於龔鵬程編，《台灣的社會與文學》，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 11 月初版，頁 168。

<sup>23</sup> 請參見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6 年 7 月，頁 3~5。

主要為台灣文學本土論者所主張。除了以兩岸分離一世紀的歷史經驗為立論基礎之外，自新文學推動以來，在台灣這個孤立環境所發展出來的「特殊性」、所形成的「台灣文學傳統」，也是論據之一，或延伸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以為論據，站在這些共同的立場上，多元論者追求相對於彼岸「中國文學」而言，「台灣文學」的發展自主性，一元論者，則以為台灣本就是獨立的個體，有獨立的民族、文化，當然「台灣文學」也應該是不從屬於「中國文學」的獨立個體，一直是在台灣獨立完成的文學傳統。

三、為與對岸的「中國文學」有所分別而提出的「台灣文學」：既為分別兩岸文學而提出除了是地理上的「台灣」來指稱此地產生的文學，當然也肯定台灣文學，在台灣與中國分離的特殊歷史經驗中，已所發展出不同於中國文學的特殊性，而且也承認台灣文學是日據台灣新文學推動以來，在台灣這個社會進行的文學活動的總稱。因為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是兩個內涵不同的範疇，所以，以「台灣文學」這個概念指稱台灣的文學。

彭瑞金亦為「台灣文學」立下一番定義：

只要在作品裡真誠地反映在台灣這個地域上人民生活的歷史與現實，是根植於這塊土地的作品，我們便可以稱之為台灣文學。因之有些作家並非出生於這塊地域上，或者因故離開了這塊土地，但只要他們的作品裏和這塊土地建立存亡與共的共識，他的喜怒哀樂緊緊繫著這塊土地的震動旋律，我們便將之納入台灣文學的陣營。<sup>24</sup>

<sup>24</sup> 彭瑞金，〈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文學界》，第2期，1982年4月，頁3。

參酌彭瑞金的想法，本研究將採游勝冠對「台灣文學」的第三種意涵，既能概括相應台灣社會條件產生的事實，又能兼顧台灣文學不同於中國文學的定義。

## 2.女工的界定

本研究所設定的女工，主要以工業化生產線上的女工為主，至於其他如女店員、女傭等不同行業類別，由於作品量更為稀少，亦與論文設定探討的職業場域不同，因此本研究選用的文本以描述加工出口區內或類似的現代化工廠之女性勞動者為取樣標的。

## 3.時段的界定

1970年代正是台灣由農業社會轉型於工業社會的關鍵階段，女工的問題也逐漸浮現。

在這個階段，台灣文學出現從「飄泊」到「尋根」的轉向，一面批判60年代標榜「橫的移植」、大量吸收歐美文學潮流的現代文學，一面高掛鮮明的本土化旗幟，本著社會意識的覺醒和回歸鄉土的理念，以真實描繪中下階層的生活來為其請命為職志，強烈寫實風格成為特色，70年代文學代表作家之一的楊青矗，就主張作家的角色與文學的功用就是在揭發社會的黑暗面：

作家固然要寫社會的光明面，但也應該針砭社會的黑暗面。對社會發生的事，對就說對，不對就說不對，不應該粉飾黑暗，昧著良心只寫不著邊際的假幻象；粉飾黑暗，即是放縱做黑暗事的人再做黑暗事，黑暗會變本加厲；社會的黑暗面應該挖出來曬

曬太陽。<sup>25</sup>

我看到社會的各種現象就想把它表達出來，文學不在於求功用，但我總希望我的東西，能對社會有一點貢獻。小說的用意，不在於教人如何做。若是真要教人如何做的辦法，那可以不必浪費篇幅寫小說。<sup>26</sup>

由以上所述，清楚透露出70年代本土文學追求的是不注重技巧的寫實，濃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尤其是毫不掩飾其為呼應中下階級訴求的命題創作，這些飽受文學家貶謫的特點，諸如筆法粗鄙，偏於事實報導，情節單調、缺乏烘托，文學性不足等缺陷<sup>27</sup>，反而大大提高作為文本解讀的可信度與價值性。

綜括來說，70年代台灣文學關懷的焦點，可概分為「農業經濟與貧窮」、「生態保育」、「政治」、「勞工」、「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等五大議題<sup>28</sup>。在這股潮流之下，女工的生活和遭遇自然也引起關注，並集中在「勞工」和「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書寫領域上。

不過十分可惜的是，這二大類作品的產量本來就不多<sup>29</sup>，所以描

<sup>25</sup> 李昂，〈喜悅的悲憫〉，《書評書目》24期，1975年4月，頁85。

<sup>26</sup> 梁景峰的訪問，〈文學的旗子〉，《筆聲的迴響》，高雄市：敦理出版社，1978年6月重排出版，頁184。

<sup>27</sup> 黃武忠，〈小說家的社會關懷：兼談于《迷惑》與楊青矗《工廠女兒圈》之比較〉，《書評書目》，第90期，1980年10月，頁32。

<sup>28</sup> 李祖琛，〈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70~79。

<sup>29</sup> 1970年代台灣的勞工文學，常被攻擊與中國的「工農兵文學」呼應，這也是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軸之一。在戒嚴體制下，被扣上「為匪宣傳」的「紅帽子」，不可謂之不重。另外，當時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工人的組織力量乏然，如同社會運動的蒼白一樣。在國家政策和社會觀感都如此不利的情況下，工人文學的題材得不到重視，作品的數量當然也就十分有限。請參見周永芳，《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6月，頁65。彭瑞金，〈「長夜漫漫」帶來的佳音－代序〉，收錄於陌上塵，《長夜漫漫》，台北市：希代出版社，1986年8月，頁12。王拓，〈當代小說所反應的台灣工人〉，《街巷鼓聲》，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7年9月，頁37~38。

寫女工樣貌的篇幅亦相對限縮，造成文本蒐集上的左支右絀，此點恰好清楚呼應著女工們受到的冷落與忽視。

穿梭埋首於文學著作的書堆中，猶如大海撈針般，儘管無法盡全，但在多方盡力查尋下，終究找到二、三十篇攸關女工生活描述的小說和新詩等文學作品，以供探討分析與交相比對。不過，畢竟參與的作家、發表的作品數量皆相當有限，實難在文學領域上建置專屬板塊，因此本研究將這些作品稱之以「女工書寫」，而不界定為「女工文學」。

投身於女工書寫者，工人作家仍為主力，楊青矗、李昌憲、陌上塵皆未缺席，三人不是勞工出身就是具有工廠的勞動經驗，對創作對象的場域熟稔，透過他們貼近的觀察描繪，加上經驗相仿下感同身受的理解，正是這些文本的價值所在。此外，楊青矗親自深入工廠實地訪查、廣發問卷的方式來蒐集資料，並常有女工讀者的來信，使得他的作品多為真實抽樣的投射，寫作亦以具體訴求作為命題，這些作品的史料價值性，當然不同於一般上層菁英為底層民眾的「代言」了。

隨著台灣產業結構提升，1982 年以後逐漸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化」時期，1984 年 8 月 1 日台灣公布《勞動基準法》，政府開放外勞的引進，加上 1987 年台灣解嚴，整個台灣的政治、經濟環境與氛圍也逐漸改變。

到了 1980 年代以後，台灣整體經濟能力提高，由於消費傾向日益高漲，過往查禁的圖書得以出版上市，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影響延伸到宰制文化圈後，文學在文化工業的產銷機制下，成了販售的商品，隨著視聽娛樂的發達，因應閱聽大眾的喜好，大眾文學推陳出新，奇幻文學（如《哈利波特》）、旅遊文學、飲食文學成為消費的主流，勞工文學的改革使命亦轉由解嚴後的社會運動代替，因此以文學紓解勞工困境的作品相對減少，勞工文學便在鮮少人士關注，少有創作問世的

情形下，更形稀落，成了邊緣中的邊緣文學<sup>30</sup>。

因此，分析上述蒐選而來的文學作品，其寫作時間大約散落在 1970~1980 年代前後，這樣的斷限也正好與台灣產業結構變化的階段相呼應，更可凸顯出這些文本蘊涵的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 4. 目前的研究成果

就目前關於女工議題的研究概況來看，專書討論女工議題的主要有歷史學者黃富三的《女工與台灣工業化》<sup>31</sup>及姜虹蘭的《台灣地區女性勞工生活素質與福利需求之研究》<sup>32</sup>，稀罕少見。其中黃富三的成書甚早，後來相關資料與研究未能納入，而且史學界亦無後繼者延續，實為一憾。

至於在學術論文方面，勞工研究領域的成果較為豐碩，包括劉在銓的〈我國現行女工福利制度之研究〉<sup>33</sup>、李怡雯的〈女工夜間工作問題之研究〉<sup>34</sup>、游鴻裕的〈經濟發展、婦女就業與家庭變遷：台灣經驗之觀察〉<sup>35</sup>、王實之的〈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下的紡織女工：台灣工業化的案例研究〉<sup>36</sup>、葉孟峰的〈加工區女性工作者的就業困境〉<sup>37</sup>等，多從福利政策與制度來檢視女工的職場及工作情況；另外，也

<sup>30</sup> 黃慧鳳，〈「工」在社稷——廿世紀台灣勞工文學研究〉，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1 月，頁 175~179。

<sup>31</sup> 黃富三，《女工與台灣工業化》，台北市：牧童出版社，1977 年 4 月。

<sup>32</sup> 姜虹蘭，《台灣地區女性勞工生活素質與福利需求之研究》，台北市：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1990 年。

<sup>33</sup> 劉在銓，〈我國現行女工福利制度之研究〉，私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年。

<sup>34</sup> 李怡雯，〈女工夜間工作問題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

<sup>35</sup> 游鴻裕，〈經濟發展、婦女就業與家庭變遷：台灣經驗之觀察〉，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年。

<sup>36</sup> 王實之，〈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下的紡織女工：台灣工業化的案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sup>37</sup> 葉孟峰，〈加工區女性工作者的就業困境〉，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有一些以區域個案作為研究對象，包括張秀密的〈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女作業員生活率動之研究〉<sup>38</sup>、柏蘭芝的〈經濟再結構中的婦女就業變遷與地域空間轉化——台北縣成衣業關廠女工再就業的個案研究〉<sup>39</sup>，這些研究成果將有助於了解不同區域、不同產業中，女工所面臨的問題之異同。

然而上列的論文，多僅以一個或少數個案為主要分析對象方式進行，其取樣的代表性是值得再討論的。不過，這些學術著述大多輔以少數個案的親視訪談，這些直接的口述記錄，將是本研究寶貴的補充。

再就從台灣文學切入探討女工的角度來看，目前還未有專篇，現有的研究多以文學批評的方式來討論整體勞工文學或單一作家的作品呈現，涉及女工議題部分則以一小章節來處理。以黃慧鳳的〈「工」在社稷——廿世紀台灣勞工文學研究〉<sup>40</sup>為例，其對女工書寫的討論僅關注於身為第二性的處境。陳曉娟的〈楊青矗小說中的抗爭主題研究〉<sup>41</sup>和侯如綺的〈楊青矗小說中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過程〉<sup>42</sup>，二者也是以小篇幅的論述加工出口區內兩性比例的失衡及女工受到的性別壓迫。

實際上，期刊論文則有較多可供參考，由於相當繁多，不及一一列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Diamond Norma 的〈台灣的婦女與工業〉<sup>43</sup>及 Gallin Bernard & Gallin Rita S 的〈台灣農村的社會經濟生活——二十

---

2001年。

<sup>38</sup> 張秀密，〈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女作業員生活率動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sup>39</sup> 柏蘭芝，〈經濟再結構中的婦女就業變遷與地域空間轉化——台北縣成衣業關廠女工再就業的個案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sup>40</sup> 黃慧鳳，〈「工」在社稷——廿世紀台灣勞工文學研究〉，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1月。

<sup>41</sup> 陳曉娟〈楊青矗小說中的抗爭主題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

<sup>42</sup> 侯如綺〈楊青矗小說中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過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論文，2001年。

<sup>43</sup> Diamond Norma 著，林佳瑩譯，〈台灣的婦女與工業〉，《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市：远流圖書公司，1979年。

年的發展與變遷》<sup>44</sup>，這兩篇由外國學者所寫的文章，不但可以比較台灣和外國女性勞工各自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問題，也可從外國學者的觀點，提供不同的探討角度和多元的看法。

### 三、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本研究試圖從文獻的彙整中，爬梳歷年來關於女工議題與文學的論述，透過文本的解讀，配合相關的統計分析與研究成果的驗證，將其置於整個歷史發展脈絡中來探討、鋪陳，並交互比對於田野調查的訪談個案，以勾勒析理出 1970~1980 年代台灣文學中女工樣貌的真實與虛構。

在章節安排上，除第一章緒論及第五章結論外，將分成下列三大部分來探討：

第二章「當父權體制遇上資本主義——從農村女兒到工廠女工」：

首先探討台灣如何被納入國際分工體系，促成台灣女工階級形成的時代背景與因素。並分成「殖民經濟的變貌——國民黨與美援遇合」、「後殖民的新依附——加工出口區的設置」、「貧弱與父權交迫——農村女性產業大軍」等三部分來論述。

第三章「浮出歷史地表的 不平悲鳴——七〇年代的初綻與發展」：

本章將從戰後台灣文學演化的軌跡，追索 70 年代女工書寫的興起和發展脈絡，並將代表性作家，包括楊青矗、李昌憲、葉香等三人，以分設專節的方式來評述與剖析，並以相關史料來交互比對，以求再現文學形塑的女性勞動者樣貌。

第四章「風聲鶴唳中的頓挫與再現——八〇年代的續航與演化」：

---

<sup>44</sup> Gallin Bernard & Gallin Rita S 著，張珣譯，〈台灣農村的社會經濟生活——二十年的發展與變遷〉，《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



80年代的台灣，政經鉅變迭生，文學面相亦幻變多元。本章將從時代的迅速變遷，梳理出80年代女工書寫的創作演化，再論究楊青矗、李昌憲、陌上塵、陳映真、呂秀蓮等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圖繪出80年代文學家建構的女工形象。

對過去在歷史研究上，總是被忽略遺漏的底層、女性而言，女工議題的思索與操演，有著重寫新頁之意義，因為：

作為這個父系歷史上被壓迫的性別群體，作為這個歷史上唯一無權參加改朝換代的治鬥爭的群體，女性是陷入統治與被統治二項對立的整個人類命運的一個自始至終的見證者。女性問題不是單純的性別關係問題或男女權力平等問題，它關係到我們對歷史的整體看法和所有解釋<sup>45</sup>。

希望透過上述議題的設定，以性別論述、由下而上的角度切入文學與歷史的詮釋，梳理架構出台灣文學的女工書寫脈絡與成果，釐清並還原女工對台灣經濟奇蹟的貢獻，並期許從「小人物」的世界，重新檢索、拼貼現代化歷程對台灣社會各層面造成的變遷，盼能切近建構嶄新的觀照面相與多元解讀。

---

<sup>45</sup> 孟悅、戴錦華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頁3。